

#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不同社經地位青少年的父母支持、同儕支持與心理健康之關係

江守峻

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

陳婉真\*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

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社經地位青少年的父母支持和同儕支持對於心理健康之影響，比較在不同家庭社經地位下，父母和同儕是否具有同等重要性，還是會因為社經地位而有所差異。研究資料來自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 (Taiwan Youth Project, TYP)，研究對象為其中 969 名國一學生。資料分析包括結構方程模型與多群組分析。研究發現：(1) 對於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父母支持對自尊有正向顯著效果、對憂鬱則有負向顯著效果，但同儕支持對自尊和憂鬱皆無顯著效果；(2) 對於低社經地位青少年，父母支持、同儕支持對自尊皆有正向顯著效果、對憂鬱則皆有負向顯著效果；(3) 相對於低社經地位青少年，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父母支持對自尊的正向效果、父母支持對憂鬱的負向效果顯著更高；同儕支持對自尊和憂鬱的效果則無顯著差異。總結來說，高社經地位青少年心理健康主要受父母親影響，且影響程度明顯高於低社經者；低社經地位青少年心理健康同時受父母親和同儕朋友影響。根據上述結果，本研究針對教育工作和未來研究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社經地位；心理健康；青少年；父母支持；同儕支持

## 緒論

貧富差距源自於社會經濟地位 (socioeconomic status, 下稱社經地位)，社經地位影響着個體從出生至成人時期的生活條件、生理狀態和心理健康等各個層面，高社經

---

\* 通訊作者：陳婉真 (wan\_chen@nccu.edu.tw)。

地位的家庭，其父母教養、家庭關係和社會資源大多較低社經地位家庭為佳；相反，低社經地位者的成長環境中則有較多危險因子和不利因素（Bradley & Corwyn, 2002）。蕭佳純（2009）的研究顯示，在高社經地位的家庭，父母較重視子女身心發展的平衡，亦較有資源幫助子女尋找自我認同，而對自我愈了解的子女，在校時有較佳的學業表現，畢業後亦有較良好的就業情形（包括較高的職業聲望、月薪和進修狀況）。這現象說明，或許不同社經地位的子女在成長過程中持續「分流」，家庭社經地位逐漸拉開低社經和高社經地位子女間的差距。Lee & Cramond（1999）認為，出生於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子女，會有較低的自我概念、較差的自我效能和對未來不抱持希望等負面心理，容易導致低社經地位子女陷入一種惡性循環，更難以突破父母原有的社經地位，反而成為代間階級複製的產物。儘管如此，社經地位未必完全決定子女的長期發展，有許多因素都有利於扭轉社經地位的負面影響。陳雅鈴（2007）探討貧窮學生的復原力（resilience），發現貧窮學生之所以能夠從不適應的情緒轉為正向調適，在於家庭成員的緊密關係、同儕支持與個人信念等因素，出身低社經地位的家庭並不能完全決定個體的身心發展。

對青少年來說，父母親和同儕朋友是影響其身心發展的重要因素（陳毓文，2006；龔心怡、李靜儀，2015；Willoughby, Polatajko, Currado, Harris, & King, 2000）。過去研究顯示，來自父母和同儕的正向支持有利於青少年保持良好心理健康（陳毓文，2004；Ikiz & Cakar, 2010; Nurius, Prince, & Rocha, 2015）。有學者指出，隨着年齡增長，孩童和青少年對父母的依賴逐漸下降，但對同儕的依賴則與日俱增（Allen & Antonishak, 2008），意味着父母與同儕的角色之間有互補的可能。Bradley & Corwyn（2002）認為，高社經地位的父母較重視子女的教育和身心發展，亦能提供較充裕的資源；相反，低社經地位家庭的親子關係不如高社經地位家庭來得緊密，子女與父母連結程度較低，受父母的影響隨之下降。所以，若將家庭社經地位納入考量，對於不同社經地位的青少年而言，父母與同儕對心理健康的影響是否會因社經地位不同而出現差異，是本研究欲探討的核心議題。綜合上述，本研究旨在比較低社經地位與高社經地位的青少年，父母支持和同儕支持對其心理健康造成的差異，期望協助不同社經地位的青少年都能維持良好心理健康，並令相關教育資源和輔導策略能有效提供幫助。

## 文獻探討

### 青少年心理健康

青少年是銜接兒童時期與成人時期的重要發展階段，青少年議題長期以來受本地和海外學者重視，並相信青少年時期的心理健康攸關往後身心發展（陳毓文，2004；

Young, Berenson, Cohen, & Garcia, 2005)。自尊 (self-esteem) 和憂鬱 (depression) 被視為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兩項重要內涵，可代表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正負向度 (周玉慧, 2015; Frederick & Ryan, 1993)。亦即自尊是正向的心理素質，憂鬱是負向的情緒狀態。所以，本研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由自尊與憂鬱所組成。下文說明兩者意義。

首先，青少年自尊是指個體自我評價後自我接納的價值感，亦即肯定自己有價值 (張春興, 2013)。Rosenberg (1965) 認為，自尊為正向與負向的自我評價，正向的自我評價來自個人獲得較多的成功經驗，負向的自我評價則是因為挫折和失落所致。由此可知，自尊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會隨着個人經驗而改變的一種內在狀態 (Baldwin & Hoffmann, 2002)。因此，青少年自尊能夠代表青少年對自我評價與肯定的程度。

再者，青少年憂鬱情緒意指個體有負向的情緒特徵，出現生理上的不適或情緒上的抑鬱，例如孤獨、失眠和頭痛等 (賴英娟、陸偉明、董旭英, 2011)。Petersen et al. (1993) 指出，青少年階段的憂鬱情緒是在未特定時間展現出鬱卒、沮喪和憂傷的感受，可能是長期、亦可能是短期的一種負面情緒狀態。近年來，青少年族群的憂鬱程度有逐漸攀升與年輕化的趨勢 (Prosser & McArdle, 1996)，青少年憂鬱問題持續受到各方學者關注。王迺燕、林美珠、周兆平、溫煥椿 (2011) 的研究指出，高憂鬱青少年的憂鬱症狀具有跨時間的連續性與影響性，高憂鬱青少年第一年的自殺傾向盛行率為 38.9%，第二年亦維持在 20.9%，顯示出台灣青少年憂鬱的嚴重性與危害。因此，青少年憂鬱可以反映出青少年心理困擾的程度。

綜合上述，本研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是根據影響後果 (outcomes) 來探討 (周玉慧, 2015)，故採用自尊和憂鬱為測量變項。

## 父母支持與同儕支持

父母支持與同儕支持都屬社會支持 (social support)，社會支持是個體與他人互動的結果，個體可因此獲得心理上的需求、工具性的協助和他人的正向評價及回饋 (House, 1981)。陳毓文 (2004) 指出，父母支持與同儕支持都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保護因子，可以降低青少年生活中危險因子對於憂鬱的作用，使青少年能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以下分別探討父母支持與同儕支持的內涵。

父母支持是指子女知覺父母教養中的正向支持與情感表達，父母支持往往影響着一個人從小到大的心理健康 (Dean & Lin, 1977)。研究顯示，父母支持對於子女身心健康發展有重要意義，子女從父母身上獲得愈多的支持鼓勵，有助於保持較佳的心理健康 (de Graaf et al., 2010)。Plunkett, Henry, Robinson, Behnke, & Falcon (2007) 的研究顯示，父母支持能顯著提升青少年的自尊和降低憂鬱。因此，父母支持應有助於提高自尊、降低憂鬱，使青少年擁有較佳的心理健康。

在探討青少年議題時同儕因素亦不可或缺，青少年時期同儕支持對身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Nurius et al., 2015; Thorne & Michaelieu, 1996)。Levitt et al. (2005) 表示，同儕支持是指個體知覺與朋友之間的正向鼓勵與關懷，包括互相傾訴心事、照顧及情感支持，且同儕支持有別於家庭支持的穩定不變，同儕相處的時間長短不會影響其對於青少年的重要性。陳毓文 (2004) 指出，同儕支持能緩衝家庭經濟壓力對於憂鬱的負面影響，有助於保護青少年因經濟壓力產生負向情緒，降低青少年的憂鬱程度。同樣，其他研究顯示當同儕支持或同儕關係愈佳時，青少年的自尊程度就愈高 (Chu, 2002; Ikiz & Cakar, 2010)。因此，同儕支持如同父母支持，對青少年具有正向意義，有助維持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 社經地位及其影響

社經地位主要包括職業、教育和收入三者，都是社會階層的主要指標。研究顯示，社經地位與個人的價值觀念、社會資本、文化資本、教養方式、教育機會和心理健康有緊密關聯，社經地位愈高，往往代表個人擁有良好的生活條件 (馬信行, 1997; 黃毅志, 2003; Sachs & Nasser, 2009; Spade, 1991; Thompson & Foster, 2014)。來自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子女，所接受的父母支持與同儕支持會有差異，並會影響其自尊和憂鬱兩方面的心理健康，以下分別討論社經地位的影響。

第一，高社經地位子女所知覺的父母支持程度，應高於低社經地位子女。高社經地位子女因為父母較重視教育，會有較高的支持和鼓勵 (蕭淑貞, 1993)。藍佩嘉 (2014) 發現，中產階級父母會採取「世代斷裂」的教養方式，會學習更有效的親子教養以取代過去其父母不良的教養方式。相對地，勞工階級父母則採取「世代延續」的教養方式，傾向複製祖輩的觀念，多以嚴厲教養對待子女，例如跟孩子溝通時，較常使用命令、恫嚇的口氣，其背後因素包括：因經濟壓力而少有餘裕學習教養方式、父母教養失職所產生的焦慮。相反，低社經地位父母較常採取低支持、多責罵的教養策略 (楊賀凱, 2009; Bradley & Corwyn, 2002)。因此，高社經地位青少年所知覺的父母支持程度，比低社經地位青少年為高。

第二，高社經地位子女所知覺的同儕支持程度，可能高於低社經地位子女。羅曉路、李天然 (2015) 指出，相對於高社經地位者，低社經地位子女較不受同儕尊重和接納，在同儕間容易被忽略。張芳全、于文灝 (2016) 指出，家長社經地位對子女知覺的同儕接納 (peer acceptance) 有正向影響，亦即社經地位會影響子女的人緣和同儕關係，反映出高社經地位者人際關係愈佳的現象。因此，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知覺的同儕支持程度，比低社經地位青少年來得高。

第三，高社經地位子女的自尊程度，可能高於低社經地位子女。蔡順良 (1985) 指出，青少年家庭的社經地位愈高，其自我肯定程度亦愈高，而且自我肯定愈高者，

其自信心與人際關係愈良好，社會焦慮愈低。同樣，Twenge & Campbell (2002) 指出，以後設分析 446 篇關於自尊與社經地位的研究論文發現，在所有年齡層中（小學生、國中生、高中生、大學生、成人、老人），社經地位愈高者，自尊程度亦愈高，尤其是進入成人時期後自尊的差距更加明顯。因此，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自尊程度，比低社經地位青少年來得高。

第四，高社經地位子女的憂鬱程度，會低於低社經地位的子。Smokowski, Evans, Cotter, & Guo (2014) 以生態系統觀點檢視導致青少年憂鬱的危險因子，結果發現低社經地位子女憂鬱程度高於其他學生，並說明是由於來自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家長較不重視教育、無法協助子女功課和較少鼓勵學業表現。加上社經地位產生的校園歧視，造成了低社經地位學生對學校的失落與無助，更增加他們罹患憂鬱的風險 (Eamon, 2002)。因此，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憂鬱程度，比低社經地位青少年低。

### 父母支持與同儕支持對不同社經地位青少年心理健康之影響

雖然父母支持、同儕支持對青少年自尊和憂鬱的關係已確立，但對不同社經地位青少年的影響可能有差異。然而，目前僅有少數學者針對低社經地位和高社經地位兩個群組同時進行比較，例如蕭淑貞 (1993) 曾比較高社經和低社經情境的母子互動關係，但仍少有分析不同社經地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相關研究。據此，本研究透過相關文獻，探討在不同社經地位背景下，父母支持與同儕支持對青少年心理健康可能具有不一樣的影響效果。

首先，父母支持對於高社經地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程度，可能高於低社經地位者。高社經地位的父母親較重視教育和子女成長環境，重視與子女之間的溝通與回應，並表達較多支持的言語 (蕭淑貞, 1993; Shonkoff & Phillips, 2000)。相反，低社經地位的父母親則傾向於採取負面管教方式，像是嚴厲教養、低溫暖和低回應的教養態度 (McLoyd, 1990)。有學者認為，可能是因為低社經地位的父母忙於工作，或無暇提供較多關愛支持，親子關係往往沒有像高社經地位家庭來得緊密 (Elder, Caspi, & van Nguyen, 1986)。所以，高社經地位的父母與子女之間有較親密的連結，較依賴和重視父母，容易受父母親支持與否的影響。相反，低社經地位的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連結程度相對較低，較不會受父母影響。因此，本研究假設「父母支持對於心理健康的影響，高社經地位青少年會比低社經地位者來得高」。

再者，同儕支持對於低社經地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程度，可能高於高社經地位者。McLoyd (1990) 認為，低社經地位父母有許多生活負面事件 (negative life events)，例如不理想的生活環境、夫妻缺乏連結和心理困擾等影響，於是低社經地位父母多採取負面教養，反而造成親子關係不佳，子女傾向依賴朋友，重視與同儕之間的情感連結，父母的影響力受到削弱 (Elder et al., 1986)。具體來說，低社經地位的

子女因為父母親的低支持、低鼓勵，且缺少充裕的溫暖關愛，會轉而將重心放在同儕身上，比較重視與同儕之間的緊密關係，所以受同儕影響的程度更高。陳毓文（2004）指出，在控制危險因子（低自尊、父母衝突與家庭經濟壓力）後，同儕支持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保護因子，能減緩青少年的憂鬱情緒。因此，本研究假設「同儕支持對於心理健康的關係，低社經地位青少年會比高社經地位者來得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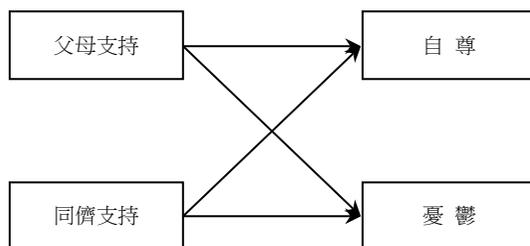
綜合上述，父母與同儕之間或許處於一種平衡關係，當低社經地位青少年及其父母因為經濟壓力導致親子關係不佳或是父母採取負面教養時，青少年可能將重心轉向尋求同儕支持，藉此滿足親子互動中缺乏的情感連結和關懷鼓勵。如同 Birkeland, Breivik, & Wold（2014）所言，同儕接納可以彌補疏遠的親子關係，緩衝與父母不親密帶來的負面效果，提升個體的自尊，而且這效果可從青少年時期一直延續到成人初期。所以，由於出身的家庭社經地位不同，青少年心理健康受到父母與同儕之間的影響處於一種擺盪狀態，高社經者可能與父母較親密，依賴父母、受父母影響較大；低社經者相對來說可能與父母較不親密，傾向轉而依賴同儕、受同儕影響較大。換言之，父母支持不僅是影響子女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同儕支持與心理健康的關係亦相當值得關注。鑑於過去文獻指出低社經地位青少年較不受同儕尊重、較容易被忽略（羅曉路、李天然，2015），更突顯提升低社經地位子女的同儕支持，或許能有效維護其心理健康。

## 研究方法

###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建構父母支持、同儕支持、自尊和憂鬱的理論模型，包含兩個潛在外衍變項（父母支持與同儕支持）和兩個潛在內衍變項（自尊與憂鬱）。根據文獻探討和研究目的，歸納的理論模型結構關係如圖一所示。

圖一：父母支持、同儕支持、自尊和憂鬱的關係模式



## 研究對象

本研究使用中央研究院「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Taiwan Youth Project, TYP)的資料，該研究由伊慶春教授總主持(伊慶春，2014)。TYP 的研究母體是 2000 年時台北市、新北市和宜蘭縣國一及國三兩個世代的學生，抽樣方式為分層多階層叢集抽樣，縣市為第一層、鄉鎮市區為第二層，分層後進行叢集抽樣(周玉慧，2015)。為了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及早維護，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 TYP 第一波國一樣本，人數共計 2,696 人。透過劃分社經地位，從國一樣本中再區分出「低社經地位青少年」(簡稱低社經組)和「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簡稱高社經組)。

社經地位的劃分根據黃毅志(2003)的「臺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該量表考量台灣本土文化和社會脈絡，界定出台灣職業聲望和社經地位的對照關係，依照職業分出五個等級的社經地位。該量表具有良好信效度，受許多學者廣泛採用(林大森、陳憶芬，2006；黃芳銘、楊世安，2006)。按照該量表對青少年父母的職業編碼，1 到 5 分分別代表社經地位的五個等級區間。接着，將社經地位的中間值(第三等級)視為「中社經地位」，第一和第二等級為「高社經地位」，第四和第五等級為「低社經地位」。並且，父母屬於相同社經地位者才納入研究樣本中，亦即若樣本屬於低社經組，父母應皆為第四或第五等級的社經地位者。如果一位家長為高社經者、另一位為低社經者，實無法明確界定其家庭社經地位，故不納入本研究對象當中。整理後，本研究樣本人數共計 969 人，低社經組 687 人，高社經組 282 人。

## 測量變項

TYP 的青少年自填問卷經由許多專家學者編製而成，具有良好的內在效度。本研究採用的測量變項包括：父母支持、同儕支持、自尊和憂鬱四個變項，內涵如下。

### 父母支持

父母支持的測量是詢問青少年知覺父母對自己的關心和支持，包括「當你真的需要他/她時，他/她就在你身邊」、「他/她了解你的想法」和「他/她常常關心你的情緒或你的問題」雙親各三題。合併後，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alpha 為 .79，分數愈高代表青少年知覺父母的支持程度愈高。

### 同儕支持

同儕支持的測量是詢問青少年知覺與好友的相處情形，包括「他(們)關心我」、

「我常會得到他（們）的一些幫助」和「我受到挫折時，總可以從（他）們那裏得到安慰」三題。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alpha 為 .79，分數愈高代表青少年知覺同儕的支持程度愈高。

## 自 尊

TYP 採用的自尊題項來自 Rosenberg (1965) 的自尊檢核量表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RSES)，共計九題。計分方式採李克特式四分量表。反向題經反向計分，由高至低依序為「很同意」、「同意」、「不同意」和「很不同意」。題目包括「我沒有辦法解決自己的某些問題（反向題）」、「我很滿意我自己」和「我用積極樂觀的態度看待我自己」等等。McKay, Boduszek, & Harvey (2014) 指出，由於 RSES 由正向自尊和負向自尊所構成，可將量表加總以測量研究對象的「整體自尊」(global self-esteem)，故有學者以「整體自尊」為單一測量變項，測量潛在變項自尊(巫博瀚、陸偉明，2010；賴英娟等，2011)。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alpha 為 .71，分數愈高代表其自尊程度愈高。

## 憂 鬱

TYP 採用的憂鬱題項來自 Derogatis (1983) 的自陳式症狀檢核表 (The Symptom Checklist-90-Resvised)，共計 16 題，包括「情緒憂鬱」、「認知憂鬱」、「行為憂鬱」和「生理憂鬱」四個分量表。計分方式採李克特式五分量表，由高至低依序為「有，很嚴重」、「有，嚴重」、「有，普通」、「有，有點」和「沒有」。題目包括「頭痛」、「鬱卒」、「擔心過度」和「失眠，不易入睡」等。各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alpha 介於 .67-.82，總量表 Cronbach's alpha 為 .88，分數愈高代表其憂鬱程度愈高。

最後，四項測量變項的 Cronbach's alpha 信度係數並不算高，顯示 TYP 在測量工具的編製上仍有改善空間。不過，整體而言信度係數還在可接受範圍。

## 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 SPSS 20 與 AMOS 22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分析，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統計和結構方程模型。在結構方程模型中，將先檢驗理論模型的測量模式具有可接受的信效度和適配度，接着才進行結構模式分析(余民寧，2006；Bagozzi & Yi, 1988)。

## 研究結果

### 描述性統計

父母支持、同儕支持、自尊和憂鬱四個觀察變項的初步分析結果見表一。整體而言，青少年有中度的父母支持 ( $M = 2.67$ )、中高程度的同儕支持 ( $M = 3.24$ )、中度的自尊 ( $M = 2.68$ ) 和低度的憂鬱 ( $M = 1.45$ )。就不同社經地位青少年的四個觀察變項比較，高社經組所知覺的父母支持、同儕支持和自尊都顯著高於低社經組，顯示社經地位高者會感受到較高程度的父母支持和同儕支持，自尊程度亦較高。最後，兩組的憂鬱程度則無顯著差異。

低社經組和高社經組四個測量變項的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結果見表二。兩組的父母支持與同儕支持、父母支持與自尊、同儕支持與自尊皆為顯著正相關，父母支持與憂鬱為顯著負相關。高社經組的同儕支持與憂鬱之相關係數為  $-0.06$ ，未達顯著水準，低社經組的同儕支持與憂鬱之相關係數為  $-0.12$ ，達顯著水準，代表低社經組同儕支持愈高，憂鬱程度愈低，但高社經組則無相關。

表一：父母支持、同儕支持、自尊和憂鬱的差異比較 ( $n = 969$ )

觀察變項	全體 (969 人)		低社經組 (687 人)		高社經組 (282 人)		<i>t</i> 值	差異比較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父母支持	2.67	.73	2.60	.72	2.82	.72	4.36***	高 > 低
同儕支持	3.24	.53	3.21	.53	3.32	.54	2.95**	高 > 低
自尊	2.68	.42	2.62	.40	2.74	.45	3.00**	高 > 低
憂鬱	1.45	.49	1.45	.49	1.45	.51	0.04	無差異

\*\*  $p < .01$ , \*\*\*  $p < .001$

表二：父母支持、同儕支持、自尊和憂鬱的相關係數矩陣

	1	2	3	4
1. 父母支持	1	.17**	.27**	-.33*
2. 同儕支持	.22**	1	.13*	-.06
3. 自尊	.13**	.15**	1	-.25**
4. 憂鬱	-.15**	-.12**	-.26**	1

\*  $p < .05$ , \*\*  $p < .01$

註：下三角為低社經組，上三角為高社經組。

## 測量模式

Anderson & Gerbing (1988) 建議，應先確保測量模式具有可接受的適配程度，再進入結構模式進行分析。估計方法為最大概似法估計法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在基本模式適配度方面，Bagozzi & Yi (1988) 指出基本模式適配度的指標為無負的誤差變異數、誤差變異達顯著水準，以及因素負荷量應介於 .50 至 .95 的合理範圍。分析結果顯示，模式中沒有負的誤差變異數，且皆達顯著水準；沒有標準化係數接近 1；因素負荷量除自尊外介於 .55 至 .90，介於合理範圍。上述四項結果顯示，本模式具可接受的基本模式適配度。在整體模式適配度方面，結果顯示，整體模式的卡方值達顯著 ( $\chi^2 = 102.96, p < .05$ )，但卡方值易受大樣本影響，故參考卡方值與自由度比值和其他模式適配度指標來判斷， $\chi^2/df$  的值为 2.64，屬於合理數值。RMSEA 值为 .041，符合小於 .05 的標準；CFI 值为 .98、符合大於 .90 的標準；NFI 值为 .97，符合大於 .90 的標準；PCFI 值为 .58，符合大於 .50 的標準；PCFI 值为 .57，符合大於 .50 的標準。綜上所述，結果符合學者建議的整體模式適配度標準 (余民寧, 2006; Bagozzi & Yi, 1988)。在內在模式適配度方面，Fornell & Larcker (1981) 建議所有的因素負荷量應大於 .50，且達顯著水準，平均變異抽取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 應大於 .50，組合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應大於 .70。根據表三結果顯示，除自尊外各測量變項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介於 .66 至 .81；潛在變項的 AVE 值介於 .51 至 .56，符合大於 .50 的標準；潛在變項的 CR 值介於 .79 至 .81，符合大於 .70 的標準。所以，本研究測量模式的內在模式適配度符合學者提出的檢驗標準 (Fornell & Larcker, 1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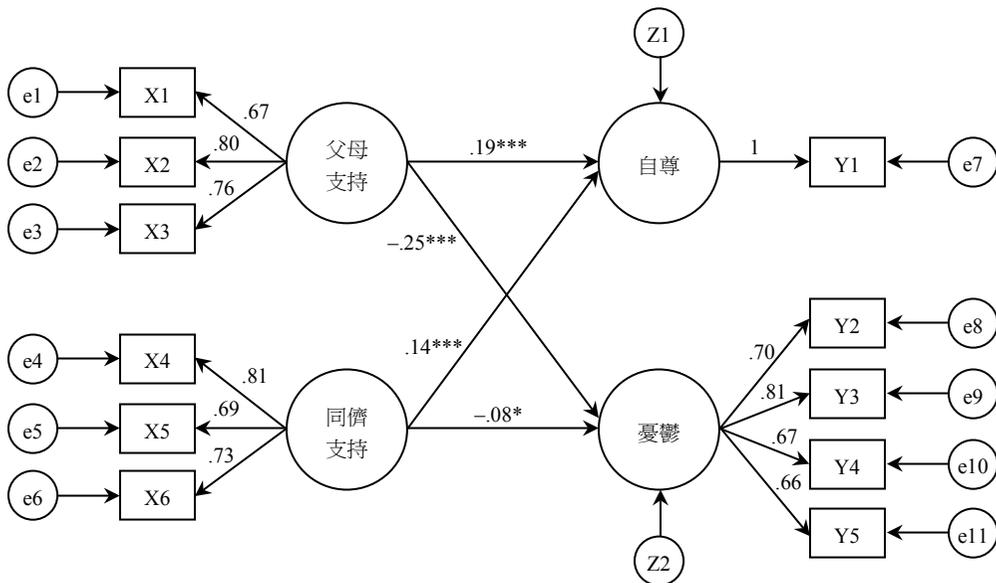
表三：測量模式的標準化參數估計

潛在變項	測量變項	標準化係數	t 值	平均變異抽取量 (AVE)	組合信度 (CR)
父母支持	X1	.68	19.42	.56	.79
	X2	.79	18.34		
	X3	.76	—		
同儕支持	X4	.80	18.66	.56	.79
	X5	.69	18.15		
	X6	.74	—		
自尊	Y1	1	—	1	1
憂鬱	Y2	.71	—	.51	.81
	Y3	.81	17.77		
	Y4	.67	17.98		
	Y5	.66	20.17		

## 結構模式

首先，本結構模式具有良好的適配程度（RMSEA = .041，CFI = .95，NFI = .94，PCFI = .71，PNFI = .70），代表結構模式成立。再者，圖二結果顯示，父母支持對自尊的係數為 .19，達顯著水準（ $p < .001$ ）；同儕支持對自尊的係數為 .14，達顯著水準（ $p < .001$ ）；父母支持對憂鬱的係數為  $-.25$ ，達顯著水準（ $p < .001$ ）；同儕支持對憂鬱的係數為  $-.08$ ，達顯著水準（ $p < .05$ ）。結果顯示，父母支持和同儕支持都能有效提升青少年的自尊程度，以及降低青少年的憂鬱情緒。

圖二：父母支持、同儕支持、自尊和憂鬱的完整結構模式



\*  $p < .05$ , \*\*\*  $p < .001$

## 多群組分析

### 測量不變性檢定

進行多群組分析的比較之前，應先確認模式的測量不變性（measurement invariance）。測量不變性從寬鬆到嚴謹依序為因素結構相當（factor structure equivalence）、因素負荷量相當（factor loading equivalence）、因素共變相當（factor covariance equivalence）和誤差變異相當（error variance equivalence）（李仁豪、余民寧，2014）。Hair, Black, Babin, Anderson, & Tatham（2006）認為，比較不同群組間的關係達到因素負荷量相當即可，亦即多群組之間具有量尺不變性（metric invariance）

的特性。表四結果顯示，兩個群組皆具有良好的模式適配程度（RMSEA = .041, .036，CFI = .98, .99，NFI = .97, .95）。接着，進行測量不變性檢定。因素結構相當模型是指兩組的因素數量和因素設定完全相等，亦即構型不變性（configural invariance），結果顯示具有良好的適配度（RMSEA = .033，CFI = .97，NFI = .95），可作模式比較的基準。因素負荷量相當模型亦有良好的適配度（RMSEA = .031，CFI = .98，NFI = .95）。Little（2013）指出，除了檢驗兩個模型的 $\Delta\chi^2$ 外，模式恆等性的寬鬆標準為 $\Delta\text{NFI}$ 小於 .05，嚴格標準為 $\Delta\text{CFI}$ 的絕對值小於 .01。結果顯示， $\Delta\chi^2$ 未達顯著水準，且 $\Delta\text{NFI}$ 小於 .05、 $\Delta\text{CFI}$ 小於 .01，代表因素負荷量相當模型與因素結構相當模型之間並沒有顯著差異，亦即測量不變性成立。

表四：多群組模型之測量不變性檢定

模型比較	$\chi^2$	df	RMSEA	CFI	NFI	$\Delta\chi^2$	$\Delta\text{CFI}$	$\Delta\text{NFI}$
低社經組	186.92	41	.061	.95	.94	—	—	—
高社經組	68.35	41	.049	.97	.93	—	—	—
因素結構相當	157.85	82	.044	.95	.93	—	—	—
因素負荷量相當	163.22	89	.042	.95	.93	5.52	.000	.002

註：在 .05 的顯著水準下， $\chi^2(7) = 14.0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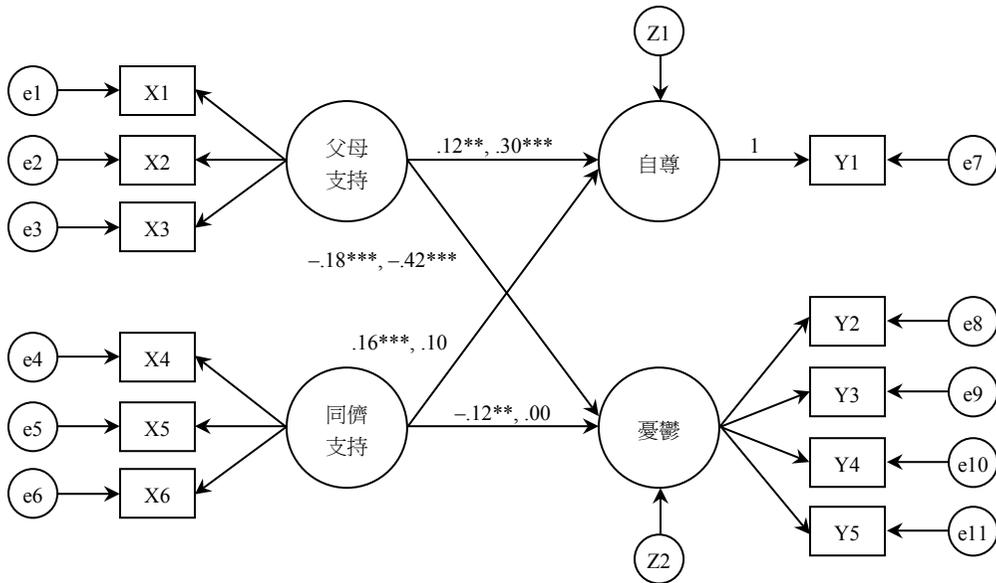
### 多群組分析的結構模式

高、低社經地位兩組在因素負荷量相當模型基礎上的結構模式見圖三。在低社經組方面，父母支持對自尊的係數為 .12 ( $p < .01$ )，達顯著水準，父母支持會提升低社經地位青少年的自尊程度。同儕支持對自尊的係數為 .16 ( $p < .001$ )，達顯著水準，同儕支持會提升低社經地位青少年的自尊程度。父母支持對憂鬱的係數為  $-.18$  ( $p < .001$ )，達顯著水準，父母支持會減少低社經地位青少年的憂鬱程度。同儕支持對憂鬱的係數為  $-.12$  ( $p < .01$ )，達顯著水準，同儕支持會減少低社經地位青少年的憂鬱程度。

在高社經組方面，父母支持對自尊的係數為 .30 ( $p < .001$ )，達顯著水準，父母支持會提升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自尊程度。同儕支持對自尊的係數為 .10 ( $p > .05$ )，未達顯著水準，同儕支持無法影響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自尊程度。父母支持對憂鬱的係數為  $-.42$  ( $p < .001$ )，達顯著水準，父母支持會減少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憂鬱程度。同儕支持對憂鬱的係數為 .00 ( $p > .05$ )，未達顯著水準，同儕支持無法影響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憂鬱程度。

綜上所述，父母支持和同儕支持都能有效提升低社經地位青少年的自尊程度，並減少其憂鬱程度。而且，父母支持能有效提升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自尊程度，並減少其憂鬱程度，但同儕支持對於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自尊與憂鬱都沒有影響力。

圖三：低社經地位與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結構模式



\*\*  $p < .01$ , \*\*\*  $p < .001$

註：逗號前為低社經組，逗號後為高社經組。

### 結構係數比較

在四條結構係數當中，有兩條結構係數在不同群組間有顯著差異，顯示出對於不同社經地位的青少年，父母支持對於心理健康的影響程度有別，高社經組的心理健康受父母支持的影響顯著高於低社經組，如表五所示。第一，高社經組父母支持對憂鬱之結構係數顯著高於低社經組 ( $\Delta\chi^2 = 7.34, p < .01$ )，說明父母支持對於降低憂鬱的效果，在高社經組顯著高於低社經組。第二，高社經組父母支持對自尊之結構係數顯著高於低社經組 ( $\Delta\chi^2 = 5.98, p < .05$ )。說明父母支持對於提升自尊的效果，在高社經組顯著高於低社經組。另外，雖然結構係數之比較未達到顯著差異，但由圖三結構模式可觀察到同儕支持對自尊與憂鬱之影響，在低社經組皆高於高社經組，甚至同儕支持並不會影響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自尊與憂鬱，代表對於低社經地位青少年而言，同儕支持具有重要意義。

表五：多群組之結構係數差異檢定

潛在變項 → 潛在變項	低社經組		高社經組		差異檢定	
	標準化係數	SE	標準化係數	SE	$\Delta\chi^2$	$\Delta df$
父母支持 → 自尊	.12**	.01	.30***	.02	6.43*	1
父母支持 → 憂鬱	-.18***	.21	-.42***	.31	9.39**	1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註：在 .05 的顯著水準下， $\chi^2(1) = 3.84$ ；在 .01 的顯著水準下， $\chi^2(1) = 6.64$ 。

## 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整體樣本分析中，父母支持和同儕支持都能顯著預測青少年自尊和憂鬱，代表整體來說父母支持和同儕支持都有助青少年保持較佳的心理健康，與過去文獻評閱結果相符(陳毓文, 2004; Plunkett et al., 2007; Willoughby et al., 2000)。不過，進一步以多群組分析發現，對於高社經地位青少年來說，父母支持具有重要影響力，父母支持會直接提升自尊並降低憂鬱，但同儕支持對自尊和憂鬱都沒有顯著影響；但是，對於低社經地位青少年來說，父母支持和同儕支持皆能顯著影響自尊和憂鬱。這結果符合過去學者指出高社經地位家庭中父母與子女的親子關係較為緊密，或是父母多採取較佳的教養方式(藍佩嘉, 2014; Shonkoff & Phillips, 2000)，故此高社經地位子女較容易受父母影響；相反，低社經地位子女因為親子關係不佳，較容易受同儕朋友影響(Elder et al., 1986)。

結構係數比較指出，父母支持對自尊的結構係數在不同社經組之間有顯著差異，高社經組的自尊受父母支持所影響比例為低社經組的兩倍以上(.30 vs. .12)。同樣，父母支持對憂鬱的結構係數在不同社經組之間有顯著差異，高社經組的憂鬱受父母支持所影響比例亦為低社經組的兩倍以上(-.42 vs. -.18)。綜上所述，對於高社經地位青少年心理健康，父母支持有着重要地位，且影響程度高於低社經地位青少年，而同儕支持對高社經地位青少年心理健康並沒有影響。對於低社經地位青少年心理健康，父母支持和同儕支持都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雖然父母影響效果仍大，但卻不如高社經地位青少年般來得明顯。

此外，結果顯示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知覺到較高父母支持、較高同儕支持，並擁有較高的自尊程度，與過去學者研究結果相同(Bradley & Corwyn, 2002; Twenge & Campbell, 2002)。但在憂鬱方面，或許由於本研究對象是年紀較輕的國一學生，高低社經組之間憂鬱差異並沒有那麼明顯，這與過去研究發現的結果不同(Smokowski et al., 2014)。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低社經地位青少年知覺到較低的同儕支持，代表其感受到的同儕支持程度顯著低於高社經地位青少年；另一方面，低社經地位青少年的同儕支持會影響自尊和憂鬱，可是同儕支持對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自尊和憂鬱都沒有顯著影響。兩相比較之下，顯示出儘管低社經地位青少年知覺到較低的同儕支持，但同儕支持卻是影響低社經地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因子，如果能提升低社經地位青少年的同儕支持，對其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義。

總結來說，本研究結果證實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受父母影響甚大，因為家庭社經條件較佳，高社經地位子女與父母親的親子關係緊密連結，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的確「靠父母」。相對來說，低社經地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雖仍會受父母影響，不過從自尊來看，同儕支持的影響甚至已高於父母支持(.16 vs. .12)，顯示出同儕朋友對於低社經地位青少年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同儕角色在某種程度

上確實彌補了低社經地位家庭不足的支持力量，補足（或取代）父母支持的匱乏（Birkeland et al., 2014）。而且，經濟弱勢青少年可能選擇出外打工來分擔家計（劉燕萍、陳毓文，2016），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下，低社經地位青少年對於家庭的依賴程度較低，有更多機會跟同儕朋友相處，遇到困難時亦會選擇向朋友求助，所以更傾向於「靠朋友」。因此，由於先天環境的差異，不同社經地位青少年會發展出不一樣的生活脈絡，調整不同對象對自己心理健康的影響，呈現父母與同儕獨特的「擺盪」現象。由此可知，本研究認為「在家靠父母」意指高社經地位青少年因家庭社經地位較佳，其心理健康與父母高度相關，較依賴於父母的支持力量，與同儕卻無關；「出外靠朋友」則意味着低社經地位青少年因家庭社經地位不佳，與同儕朋友連結較高，其心理健康不只與父母有關，與同儕亦有高度相關。

本研究針對教育現場與諮商輔導實務工作提出三項建議：

1. 由本研究結果可知，父母親的支持力量是影響高社經地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因此建議協助學校人員了解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狀況，若要提升其自尊程度和降低憂鬱情緒，可藉由舉辦親職教育相關活動或透過親師座談，鼓勵高社經地位家庭的父母多表達對子女生活上的支持和肯定，將有助於提升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2. 父母親與同儕朋友的支持力量都是影響低社經地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因此建議校方人員除了同樣提升低社經地位家庭父母對子女的支持肯定，應再促進低社經地位青少年與同儕團體的互動經驗，一者為透過輔導室研擬同儕關係相關的團體方案和工作坊，二者是加強校內社團活動與同儕合作的機會，藉以增進同儕間互相支持的力量和感情。此外，校方應着重提升校園友善環境，減少學校人員與學生對低社經地位青少年的刻板印象或歧視，例如保護清寒學生的個人資料和隱私、公平對待低社經學生與其他學生，以及輔導室可加強對低社經地位子女的家庭生活狀況和同儕關係的介入及輔導等相關措施，將能有效增進低社經地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3. 在助人工作方面，藉由本研究結果，助人工作者可了解到對不同社經地位青少年，父母支持和同儕支持的影響程度不同，高社經地位青少年較容易受父母影響，同儕朋友則較無影響力，低社經地位青少年則會受父母和同儕影響，所以在評估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時，可針對低社經和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發展出不同的個案概念和處遇策略。不過，助人工作者仍需謹慎考量青少年個別的生活脈絡和個體差異，本研究結果僅是輔助而非建議助人工作者武斷地推論至全體青少年。

關於未來相關研究亦有三項建議：

1. 過去少有研究比較不同社經地位的研究對象，故本研究屬於初探性質，試圖說明

隱藏在整體樣本下，不同社經地位者其實有不同的路徑關係。但是受限於研究範圍和篇幅，只比較高社經組和低社經組，至於介於兩者之間的中社經組，則未能整合分析。建議未來學者可以納入中社經組進行多方比較，更全面探究和理解不同社經地位的青少年。

2. 本研究使用 TYP 的國一樣本，未來學者可進一步以本研究模式比較不同年齡層青少年的父母支持、同儕支持對自尊和憂鬱的影響程度是否仍有差異，以及模式是否亦具有良好適配程度。透過不同年齡層的比較，或許可以探究青少年心理健康受到父母和同儕的影響程度與年齡的關係。
3. 近年來，長期縱貫性研究備受重視，TYP 亦是台灣相當具代表性的長期追蹤資料庫，故未來學者可串連不同波次的青少年樣本，了解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長期變化軌跡與時間消逝的關係。

## 參考文獻

- 王迺燕、林美珠、周兆平、溫煥椿（2011）。〈高憂鬱情緒青少年之憂鬱疾患及自殺傾向：跨一年追蹤之研究〉。《中華心理衛生學刊》，第 24 卷第 1 期，頁 25-59。  
doi: 10.30074/CJMH.201103.0002
- 伊慶春（2014）。〈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國一樣本（J1）第一波，青少年問卷（公共版）〉。擷取自 [https://srda.sinica.edu.tw/datasearch\\_detail.php?id=918](https://srda.sinica.edu.tw/datasearch_detail.php?id=918)
- 余民寧（2006）。《潛在變項模式：SIMPLIS 的應用》。台北，台灣：高等教育。
- 巫博瀚、陸偉明（2010）。〈延宕交叉相關與二階層線性成長模式在台灣青少年自尊的發現〉。《測驗學刊》，第 57 卷第 4 期，頁 541-565。
- 李仁豪、余民寧（2014）。〈臺灣中老年人外向性及神經質人格、社會支持與主觀幸福感關係之模型建構及其結構係數比較〉。《教育心理學報》，第 45 卷第 4 期，頁 455-474。  
doi: 10.6251/BEP.20130725
- 周玉慧（2015）。〈青少年至成年初期親子關係的變化及其影響〉。《中華心理學刊》，第 57 卷第 1 期，頁 67-89。doi: 10.6129/CJP.20140831
- 林大森、陳憶芬（2006）。〈臺灣高中生參加補習之效益分析〉。《教育研究集刊》，第 52 輯第 4 期，頁 35-70。
- 馬信行（1997）。〈一九九〇年人口普查中教育與職業資料之分析〉。《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 75 期，頁 29-66。
- 張芳全、于文灝（2016）。〈國中生家庭社經地位、關係攻擊、同儕接納與自然科學學習動機之縱貫性研究〉。《彰化師大教育學報》，第 28/29 期，頁 53-80。
- 張春興（2013）。《現代心理學》（重修版）。台北，台灣：東華書局。
- 陳雅鈴（2007）。〈貧窮學童復原力發展之研究：以總統教育獎得主為例〉。《屏東教育大學學報》，第 26 期，頁 1-36。

- 陳毓文 (2004)。〈少年憂鬱情緒的危險與保護因子之相關性研究〉。《中華心理衛生學刊》，第 17 卷第 4 期，頁 67-95。doi: 10.30074/CJMH.200412.0003
- 陳毓文 (2006)。〈一般在學青少年自殘行為之相關環境因素初探〉。《中華心理衛生學刊》，第 19 卷第 2 期，頁 95-124。doi: 10.30074/CJMH.200606.0001
- 黃芳銘、楊世安 (2006)。〈家庭因素對國小學童環境行為影響模式之研究〉。《師大學報：教育類》，第 51 卷第 1 期，頁 159-183。doi: 10.3966/2073753X2006045101008
- 黃毅志 (2003)。〈「臺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之建構與評估：社會科學與教育社會學研究本土化〉。《教育研究集刊》，第 49 輯第 4 期，頁 1-31。
- 楊賀凱 (2009)。〈父母社經地位對父母管教價值與方式的影響——檢證 Kohn 的理論在臺東國中生父母之適用性〉。《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第 40 卷第 2 期，頁 145-179。
- 劉燕萍、陳毓文 (2016)。〈經濟弱勢少年半工半讀經驗與憂鬱情緒之相關性：壓力過程觀點〉。《臺灣社會工作學刊》，第 17 期，頁 43-94。
- 蔡順良 (1985)。〈家庭社經地位、父母管教態度與學校環境對國中學生自我肯定及生活適應之影響研究〉。《教育心理學報》，第 18 期，頁 239-264。
- 蕭佳純 (2009)。〈家庭社經地位、自我概念、學業表現對大學畢業生就業情形之探討〉。《當代教育研究季刊》，第 17 卷第 3 期，頁 1-40。doi: 10.6151/CERQ.2009.1703.01
- 蕭淑貞 (1993)。〈比較高社經與低社經情境母子互動關係之初步研究〉。《公共衛生學會雜誌》，第 12 卷第 2 期，頁 164-176。doi: 10.6288/JNPHARC1993-12-02-05
- 賴英娟、陸偉明、董旭英 (2011)。〈以結構方程模式探討台灣大學生自尊、生活目標、希望感及校園人際關係對憂鬱情緒之影響〉。《教育心理學報》，第 42 卷第 4 期，頁 677-699。
- 藍佩嘉 (2014)。〈做父母、做階級：親職敘事、教養實作與階級不平等〉。《台灣社會學》，第 27 期，頁 97-140。doi: 10.6676/TS.2014.27.97
- 羅曉路、李天然 (2015)。〈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留守兒童同伴關係的影響〉。《中國特殊教育》，第 2 期，頁 78-83。
- 龔心怡、李靜儀 (2015)。〈影響國中經濟弱勢學生之學業表現與中輟傾向之因素：以「脈絡-自我-行動-結果」之動機發展自我系統模式為取向〉。《教育科學研究期刊》，第 60 卷第 4 期，頁 55-92。doi: 10.6209/JORIES.2015.60(4).03
- Allen, J. P., & Antonishak, J. (2008). Adolescent peer influences: Beyond the dark side. In M. J. Prinstein & K. A. Dodge (Eds.), *Understanding peer influence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pp. 141-160). New York, NY: The Guilford Press.
- Anderson, J. C., & Gerbing, D. W. (1988).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practice: A review and recommended two-step approa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3(3), 411-423. doi: 10.1037/0033-2909.103.3.411
- Bagozzi, R. P., & Yi, Y. (1988). On the evaluation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16(1), 74-94. doi: 10.1007/BF02723327
- Baldwin, S. A., & Hoffmann, J. P. (2002). The dynamics of self-esteem: A growth curve analysi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1(2), 101-113. doi: 10.1023/A:1014065825598

- Birkeland, M. S., Breivik, K., & Wold, B. (2014). Peer acceptance protects global self-esteem from negative effects of low closeness to parents during adolescence and early adulthood.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3(1), 70–80. doi: 10.1007/s10964-013-9929-1
- Bradley, R. H., & Corwyn, R. F. (2002).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hild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3, 371–399. doi: 10.1146/annurev.psych.53.100901.135233
- Chu, Y. W. (2002).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omain-specific self-concepts and global self-esteem among adolescents in Taiwan.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3(2), 103–123.
- de Graaf, H., Vanwesenbeeck, I., Woertman, L., Keijsers, L., Meijer, S., & Meeus, W. (2010). Parental support and knowledge and adolescents' sexual health: Testing two mediational models in a national Dutch sampl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9(2), 189–198. doi: 10.1007/s10964-008-9387-3
- Dean, A., & Lin, N. (1977). The stress-buffering role of social support: Problems and prospects for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Th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65(6), 403–417.
- Derogatis, L. R. (1983). *SCL-90-R: Administration, scoring and procedures manual-II for the R(revised) version and other instruments of the psychopathology rating*. Baltimore, MD: Clinical Psychometric Research.
- Eamon, M. K. (2002). Influences and mediators of the effects of poverty on young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1(3), 231–242. doi: 10.1023/A:1015089304006
- Elder, G. H., Jr., Caspi, A., & van Nguyen, T. (1986). Resourceful and vulnerable children: Family influences in hard times. In R. K. Silbereisen, K. Eyferth, & G. Rudinger (Eds.), *Development as action in context: Problem behavior and normal youth development* (pp. 167–186). Berlin, German: Springer.
- Fornell, C., & Larcker, D. F. (1981).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8(1), 39–50. doi: 10.2307/3151312
- Frederick, C. M., & Ryan, R. M. (1993). Differences in motivation for sport and exercise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participation and mental health. *Journal of Sport Behavior*, 16(3), 124–146.
- Hair, J. F., Black, W. C., Babin, B. J., Anderson, R. E., & Tatham, R. L. (2006).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6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 House, J. S. (1981). *Work stress and social support*.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Ikiz, F. E., & Cakar, F. S. (2010).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self-esteem in adolescence.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5, 2338–2342. doi: 10.1016/j.sbspro.2010.07.460
- Lee, J., & Cramond, B. (1999).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mentoring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students. *Professional School Counseling*, 2(3), 172–178.

- Levitt, M. J., Levitt, J., Bustos, G. L., Crooks, N. A., Santos, J. D., Telan, P., ... Milevsky, A. (2005). Patterns of social support in the middle childhood to early adolescent transition: Implication for adjustment. *Social Development, 14*(3), 398–420. doi: 10.1111/j.1467-9507.2005.00308.x
- Little, T. D. (2013). *Longitudina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New York, NY: The Guilford Press.
- McKay, M. T., Boduszek, D., & Harvey, S. A. (2014). The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A bifactor answer to a two-factor ques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96*(6), 654–660. doi: 10.1080/00223891.2014.923436
- McLoyd, V. C. (1990). The impact of economic hardship on Black families and childre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parenting, and socioemotional development. *Child Development, 61*(2), 311–346. doi: 10.1111/j.1467-8624.1990.tb02781.x
- Nurius, P. S., Prince, D. M., & Rocha, A. (2015). Cumulative disadvantage and youth well-being: A multi-domain examination with life course implications. *Child and Adolescent Social Work Journal, 32*(6), 567–576. doi: 10.1007/s10560-015-0396-2
- Petersen, A. C., Compas, B. E., Brooks-Gunn, J., Stemmler, M., Ey, S., & Grant, K. E. (1993). Depression in adolesc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48*(2), 155–168. doi: 10.1037/0003-066X.48.2.155
- Plunkett, S. W., Henry, C. S., Robinson, L. C., Behnke, A., & Falcon, P. C., III. (2007). Adolescent perceptions of parental behaviors, adolescent self-esteem, and adolescent depressed mood.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16*(6), 760–772. doi: 10.1007/s10826-006-9123-0
- Prosser, J., & McArdle, P. (1996). The changing mental health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Evidence for a deterioration?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6*(4), 715–725. doi: 10.1017/S0033291700037739
- Rosenberg, M. (1965).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achs, D., & Nasser, K. (2009). Facilitating family occupations: Family member perceptions of a specialized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63*(4), 453–462. doi: 10.5014/ajot.63.4.453
- Shonkoff, J. P., & Phillips, D. A. (Eds.). (2000). *From neurons to neighborhoods: The science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 Smokowski, P. R., Evans, C. B. R., Cotter, K. L., & Guo, S. (2014). Ecological correlates of depression and self-esteem in rural youth. *Child Psychiatry and Human Development, 45*(5), 500–518. doi: 10.1007/s10578-013-0420-8
- Spade, J. Z. (1991). Occupational structure and men's and women's parental value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2*(3), 343–360. doi: 10.1177/019251391012003006

- Thompson, R. B., & Foster, B. J. (2014).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predict metacognitive questions to preschoolers.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43(4), 315–333. doi: 10.1007/s10936-013-9256-4
- Thorne, A., & Michaelieu, Q. (1996). Situating adolescent gender and self-esteem with personal memories. *Child Development*, 67(4), 1374–1390. doi: 10.1111/j.1467-8624.1996.tb01802.x
- Twenge, J. M., & Campbell, W. K. (2002). Self-esteem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A meta-analytic review.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6(1), 59–71. doi: 10.1207/S15327957PSPR0601\_3
- Willoughby, C., Polatajko, H., Currado, C., Harris, K., & King, G. (2000). Measuring the self-esteem of adolescents with mental health problems: Theory meets practice. *Canadi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67(4), 230–238. doi: 10.1177/000841740006700405
- Young, J. F., Berenson, K., Cohen, P., & Garcia, J. (2005). The role of parent and peer support in predicting adolescent depression: A longitudinal community study.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5(4), 407–423. doi: 10.1111/j.1532-7795.2005.00105.x

## **Relying on Parents and Friends: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and Peer Suppor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Adolescents With a High and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Shou-Chun CHIANG & Wan-Chen CHEN

###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how parental and peer support influence the mental health of adolescents with a high and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By comparing the SES of adolescents, we examined whether parents and peers have the same importance and whether their influence on mental health differs. Data were provided by the Taiwan Youth Project. The participants were 969 first-grad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a) For the adolescents with a high SES, parental support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self-esteem a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depression. Furthermore, peer support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self-esteem and depression. (2) For the adolescents with a low SES, both parental and peer support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self-esteem a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depression. (3) The parental support of the adolescents with a high SES had an increasing effect on self-esteem and depression, which was in contrast to the adolescents with a low SES. In conclusion,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adolescents with a high SES was primarily affected by parents, whereas that of the adolescents with a low SES was affected by parents and peers. Based on the results, suggestions for education and future research were provided.*

*Keywords: socioeconomic status; mental health; adolescent; parental support; peer support*

---

**CHIANG, Shou-Chun** (江守峻) is a master's student in the MA Program of Counseling and Guida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CHEN, Wan-Chen** (陳婉真) is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er in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